

中国文化史丛书

儒门圣典

—《四书》和《五经》

马玉春

沈阳出版社

煮海为言的圣典

——《四书》《五经》

马玉春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一、总论《四书》《五经》	(1)
二、天命曰仁	
——《论语》	(9)
三、浩然正义	
——《孟子》	(22)
四、入德之门	
——《大学》	(32)
五、传心之奥	
——《中庸》	(39)
六、思无邪	
——《诗经》	(45)
七、四代皇册	
——《尚书》	(65)
八、天人合一	
——《周易》	(75)
九、经纪人伦	
——《礼记》	(85)
十、微言大义	
——《春秋》	(94)

一、总论《四书》《五经》

中国历史上，恐怕再也没有书能象《四书》《五经》那样，获得历代帝王将相的青睐；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再没有书象《四书》《五经》那样，代代相传，大化的精神风铸千余年来数不清的思想者们的崇圣人格，也滋润着千百年来平民百姓敦厚的心田。然而《四书》《五经》作为昔日的圣典，风光早已暗淡。这个世纪初叶的那场新文化运动，象一团烈火，焚烧了古汉语，也熏焦了中国人性命攸关的远古文化。

孔子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逝去的难道仅仅是长河浊水。精神文化的长河不也奔腾不息，逝者如斯吗？圣人站在河边喟叹的是他永远崇扬的远古大道的消隐。今天，每当站在空旷的天穹之下，头顶如水的星光，我就仿佛感到，那逝去的并没有永远消逝，我依然能从心底重现那几本来自远古的书，追忆它们那灿烂的精神星光。

1. 经部与经义

我国区分图书部类的“目录学”始于西汉刘歆的《七略》。七略者，即指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

术数略、方技略。六艺即指六经。自《七略》后，一直到清代《四库全书》等重要图书目录，均有经部且置于首位或前列。可见“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

这里讲的“六艺”即“六经”，亦即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命脉的六本书：《诗》、《书》、《易》、《礼》、《乐》、《春秋》。

那么，“经”的本义究竟如何，“经”有什么独特的含义，竟使它在学术史上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位置？

就“经”的本义而言，古人有两种说法。其一：认为经书乃官修书，与私人著述不同，它是钦定之书。“六艺”是周公旧典，按照《论语集解序》说，六经的书简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则只有八寸，六经的书简特长，就象今天的特大精装书籍，因为它是官修之故也。另一个说法认为，经书乃圣者之书，《释名》中说：“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文心雕龙·宗师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要道，不形之鸿教也。”郑玄《孝经注》说：“经者，不易之称。”他们都认为，六经乃孔子所作，可以垂教万世“天下变一道亦不变。”（董仲舒语）

今人从词源与义理上考证认为，“经”的原始意义是指织物的经线而言，古人把它推广到治理天下的道理，就是理顺千头万绪的纲领，有了纲领，治国安邦才有条理，这也正如丝织物必须有经纬一样。因此，有经有纬才能有丝织物的道理，便可推借到“经纶天下”之意。《易经·屯卦》上说，“君子以经纶”，即是由经纬而假为“经纶”的例证。由此，经又可以引申为法则。《王篇·系部》“经，义也。”《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举挂时纲，动乱国经”，这里把“经”字作为标准，治国安邦的法则。由此看来，凡是古代先圣先哲

的言论、行动、政治教化刊载于典籍，而起到训诫后人法则作用的，我们就崇为“经”。根据典籍、训诂和经在传世中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古代圣者言行政教记录的典籍，可以成为后人行为规范和治理国家法则的，都可以叫作“经”。“经”告诉人们修行品德、处世待人、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2. 经名与经用

“经”本来是指六经而言。“经”的名称，在《国语》成书以前的典籍中，没有经的名称。《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等初为经，都是后人给题的名称。《孝经》引用孔子的话，“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这是先秦典籍中最早称为经名的。《庄子·天运篇》则说：“丘语《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以为文。”中国典籍中以此六本书为“六经”，从此开始。由此看来，“经”的名称之出现，还是远在秦汉以前。

秦汉以后，随着岁月变迁，经书整理、考证与研究的深入，随着中国学术史上最恒久也是最令历代文人学士们醉心沉缅的经学的发展，“经”的数目也开始不断变化。“经”的数目历汉、魏、唐宋逐渐增加，于是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众多名目。

继《庄子·天运篇》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之为六经之后，汉代班固《汉书》在六经之上另增《论语》，称之为“七经”，清康熙年间《御纂七经》则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为“七经”。

唐时设立的学官，把《易》、《诗》、《书》、《周礼》、《仪

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九种典籍称之为“九经”。《宋书·百官志》把《易》、《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编为“经”，把《论语》和《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

至此，唐代完成的“十三经”则是指《易》、《诗》、《书》、《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十三经”在宋以前已有注释，但疏则到南宋才告成，清乾隆年间，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校勘记，此乃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之全貌。

《十三经》虽然囊括了原始儒家的典籍，但其文化中坚和思想命脉所在仍是“六经”和后来编成的《四书》。关于“六经”的功用，历来有许多注释和评说。《庄子·天下篇》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曾引用孔子的话说“六艺之于治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进一步引申发挥说：“《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溪，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因为《诗经》以赋物象形，借物比兴，表达感情，故以风作喻，称之为“道志”“达意”“长于风”。《尚书》乃是记

录远古舜、禹、夏、商、周五代君臣言论文告及其重大事件的典籍，所以说它“道事”且“长于政”。《仪礼》乃训导人们的行为举止、节制人们的仪态，所以称它为“道行”、“节人”、“长于行”。《乐经》则是陶冶人们性情、使情感和谐的典籍，所以称之为“道和”、“发和”、“长于和”。《周易》的卦爻是用阴阳符号代表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所以称它“道阴阳”、“神化”、“长于变”。《春秋》则是一部寄寓褒贬、辨析正名、分别是非的典籍，所以称它为“道义”、“长于治人”。《汉书·艺文志》说：“《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五常之道，而《易》之为原。”班固以“六经”配仁、义、礼、智、信五常，这就是说，五经合五常之用而《周易》为之原。这是从功用上看“六经”。

从经书的体制上看六经，六经对后世中国几千年辗转不息的文章体裁具有深远的范导意义。后来文章体裁，“六经”几乎全部包容。一般而言，《周易》为后来“论”、“辩”、“说”、“解”、“序”、“跋”等体裁的先河；《尚书》统后来“诏”、“策”、“章”、“奏”、“表”、“启”等体裁之首；《诗经》则发后来“辞”、“赋”、“颂”、“赞”、“诗”、“词”、“歌”、“曲”等体裁之源头；《春秋》是后来“记”、“传”、“移”、“檄”、“关”、“牒”等体裁之根；《礼记》则主后来“铭”、“谏”、“规”、“箴”、“视”、“祭”等体裁之本。由此可见，后世文体，漫衍支离，丛生复杂，但追根究源，仍宗之先秦经书。刘勰深谙文体流变之势，故在《文心雕龙》中说：“文能宗经，体有六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情而不轻；

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华；六则文丽而不注。以为稟经制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言”。

3. 《四书》与《五经》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文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后世理学家讲伦理、哲学、政治的十七字令。《中庸》相传为战国时代子思作，内容是讲“中庸”乃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了“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思想。把“诚”看作世界的本体，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知之路。《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由孔子及其门人及再传弟子辑成。《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的书，为孟子及其门徒所作。

《大学》、《中庸》原为汉代戴圣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两篇，《礼记》属六经中一经。从汉宣帝时代起就被列于学官（五经博士）。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曾为之疏。《论语》在汉代就已成为专门的学科，有专人传授，在三国时列于学官，地位与“经”相等。只有《孟子》，虽有东汉赵岐作过注，但自《汉书·艺文志》以下都将它列入子部，不与五经同科，显然位居经之下。直到唐代古文家韩愈倡道统、辟佛老、盛赞孟轲斥扬墨以扶翼先王之道，《孟子》的地位才得以提升。韩愈曾在《原道》篇中说过以下这段铿锵有力的话，令宋明以下几代探究理学、道学的智者贤士们怦然心动，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

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深受韩愈影响的李翱把孟子的“性善”论，《中庸》的“天命率性”观，《大学》的“正心诚意”说，合为一体，作《复性书》，张扬儒家道统思想。韩愈、李翱的思想，大大激发了宋代理学家们的儒家智慧和道学思想，并且实际上也为宋代新儒家们倡导道统、心学思想开了先河。

北宋时代，儒家炽盛。程颢、程颐、朱熹以倡导道学为己任，更加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它们是道学思想之本旨所在。由此，二程以义理为宗旨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卓有精论。至淳熙年间，朱熹在二程评论的基础上，撰写《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合称四子书。于是《大学》、《中庸》两篇遂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书。《四书》之名始立。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不仅取汉、唐注疏，而且博采诸说之长，成为后世学者治经之阶梯。朱于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训说立于学官。元仁宗延祐间恢复科举，考试经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采用朱子章句集注为解题之本。历明清数百年封建统治者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事实上，《四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古代中国社会知识阶层中具有教科书的重大作用，也在《四书》中的高远的人生理想，宏大的社会道义，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仍然可以浸润国人的文化心理，濡染我们的社会风尚，对整个民族心理起到强大的凝聚作用。

“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著作的通称。这些著作本来古已有之，至汉代，儒家学派把它们奉为经典，始有“五经”之称，汉代“五经”是宋以后与《四书》合称的《五经》的基础。

《诗经》，孔子称之为“诗三百”或“三百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反映了西周至春秋这段漫长历史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民情风貌。《尚书》也叫《书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叙和议论的著作。内容大部分是一些誓词、告诫之类的文字。《周易》亦称《易经》，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演变，并有说明卦辞和爻辞的文字，原为占卜之用，兼有演示历史与人事命运之功。“传”包括解释卦、爻辞的七种文词共十篇，统称十翼。《周易》通过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礼经》又叫《三经》，由《周礼》、《仪礼》、《礼记》三个部分组成，乃先秦时代官制、礼制及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春秋》亦称《春秋经》，作者为孔子，是我们史学史上，第一部私人撰编的历史著作。它记叙了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〇年）二百四十二年间各国大事。其纪事文字简短严谨，暗含褒贬，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该书对后世哲学、政治、历史思想均产生重大影响。

二、天命曰仁

——《论语》

1. 《论语》编纂

《论语》是这样一部著作，它记录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录着孔子的弟子们的言语行事。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刘熙《释名·释典·艺》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释名》以音训为主，所以以伦理论，以叙训语。如刘熙所释，那么《论语》则因为有伦理之语而得名，与上述班、陆之说相异。

从上述两段话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要点，可作较为妥贴

的定论：

其一，《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话语、言语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辑合”起来的意思。

其二，“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了的，不是后人所追加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时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思是言语的论纂。

那么《论语》它的作者是谁呢？究竟编纂于何时呢？

《论语》是若干片断的篇章集合体，类似于今天通常见到的“格言集”或“警句格言集成”。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之间也不一定有什么紧密的关联。从《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多次重复的章节和重复的语句看，《论语》一书决非一人著成，很可能是多人合作完成。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众弟子把各自的记录汇集起来编纂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的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甚远。那么，《论语》书最后的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代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认定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其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录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算最多。除了和孔子问答之词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与孔子的语合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

其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录着曾参临死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事，再没有比这更晚了。

由是可以推论以下两点。

其一，《论语》的最后编定者即是曾参的学生。

其二，《论语》的著笔时间始于春秋末期，而编定成书则大概在战国初期，约七十年时间，这或许是接近历史史实的。

本节附录一

《论语》目次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治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本节附录二

《论语》重要注疏本

1.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2. 《论语集注》宋朱熹作
3. 《论语正义》清人刘宝楠著
4. 《论语疏证》今人杨树达著

2. 《论语》中的“天命”与“鬼神”

孔子继承传统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观，在《论语》中单独

谈“天”有十八次。比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巍巍乎唯天为大。”^①“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节何？”^②“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③

“子长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如予何？’”

从上述征引的孔子所言，“天”有三种含义：其一，是自然之天，其二，是主宰或命运之天，其三，是义理之天。

《论语》中谈论“命”，凡五次，讲天命共三次。分别如下：

“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④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⑤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⑥

“五十而知天命。”^⑦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⑧

综合孔子的“天”与“命”，可以看到，孔子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命决定，而且还认为，他的“德”，他所肩负的复兴文化的使命也是天所赋予的。孔子承认天是主宰，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也是人的生死，社会兴衰的主宰。因而他相信天命是存在的，天命决定着世间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过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西周盛行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作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认识（知）天命而积极努力，自强不息，而不应该消极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自暴自弃，放

弃自己的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显然，在孔子看来，“仁”也是天命所给予人的。

孔子相信“天命”，但对“鬼神”却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对“鬼神”问题，不象他对“天命”那样坚信不疑。他的学生子路问他鬼神的问题，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关于死后的问题，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还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⑧只从这几句看，孔子好象是个无神论者，但事实上他对鬼神也并非完全否定。他推崇禹，认为禹这个人有许多伟大之处，这是因为他“菲饮食而致孝于鬼神”^⑨，这是说，禹尽管自己饮食很菲薄，但对鬼神的孝敬祭祀却很丰盛，因此禹很值得敬佩。

在《论语》中，还记载了“子不语怪、力、乱、神”，^⑩这表明孔子对鬼神问题采取的慎重态度。鬼神的地位，在孔子心中比起天命来，是次要的。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⑪这是说，既然要祭，就要象面临鬼神一样，就要认真地祭，不要采取敷衍的态度。这一切都表明了孔子虽然不大相信鬼神的实有，但却又不公开的否定它，而是利用它，这是另有一番苦心的。孔子之所以仍对鬼神问题持一种暧昧的态度，用曾参的话讲是，鬼神问题，可以使人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是想通过对鬼神问题的不置可否的回答，唤起人们追念已经逝去的祖先与过去，回忆往日的淳朴与深厚的风情。

因此，孔子再三教导弟子们首先要畏天命，因为天命不可违，还要亲身践行天赋使命，其次要“敬鬼神”，因为敬祭鬼神，可以使人们“民德归厚矣”。

3. 《论语》的“仁”与“忠恕”